

中俄文学交流中的俄罗斯文学译介研究

高瑞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 中国与俄罗斯互为最大邻邦, 地理位置相邻, 两国文学均为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两国的文学交流起步甚晚。尤其是俄国文学, 直到 19 至 20 世纪才传入中国。本文梳理了俄国文学在中国传播的不同阶段及各阶段特点, 并探析了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与启示, 旨在为中俄文学文化交流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俄国文学; 中俄文学交流; 传播与融合; 跨文化交流; 文化自信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09. 045

由于中俄两国的地理位置及历史背景, 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翻译和引介, 在百余年来中俄文化交往史中, 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且曾对中国文学发展史乃至社会思想变迁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 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是中国少数文科中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专业。可以说, 中国人几乎翻译了整个俄国文学。俄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大概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文学相遇期: 起步甚晚

中俄虽互为最大邻邦, 但相较于中国与印度、日本等国的交往, 两国的文学交流却是起步晚的不可思议。最早在 1759 年, 元剧《赵氏孤儿》被翻译为俄语, 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俄国的开端。此后, 1772 年, 收录数篇中国寓言的《中国思想》一书在彼得堡出版, 这是俄国出版的第一本中国文学作品的单行本, 由法文翻译而来。那时的欧洲掀起了一场以法国为代表的“中国热”, 中国的丝绸和陶瓷等备受欢迎。相应地, 中国的文学也开始在欧洲出现。相比之下, 俄国作品进入中国地步伐就更为迟缓。第一部被翻译为中文的俄国文学作品是普希金的作品《上尉的女儿》, 出版于 1903 年。但彼时这部作品的名称是《俄国情史: 斯密斯玛丽传》, 又名《花心蝶梦录》。这本书也并非直接从俄语翻译而来, 而是转译自日文。综上所述, 中俄早期的文学交往并非是直接的, 而是借助了第三种语言中转而来。

从“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开始, 俄国文学逐渐被翻译引介到中国, 中国也由此开始正式接纳俄国文学。尽管俄国文学译介到中国的时间稍晚, 但起步就从普希金开始, 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巧合。此后, 俄国文学作品便顺势进入中国,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为中文, 收获了一批中国读者。不过,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作品多是从日文和英文

转译而来, 且大多是意译, 译文也是文言文形式。但这并不阻碍俄国文学已经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兴趣。

2 “五四”时期: 盛极一时

鲁迅先生曾言,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 俄国文学是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五四”运动爆发后,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探索一条新的救国救亡之路, 而苏联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当时俄国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批判性, 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核心命题是: 人性本善, 但环境是恶, 恶劣的环境使人变恶, 因此要通过改变环境使人性回归善良。这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高度契合。所以鲁迅、李大钊、瞿秋白等众多早期知识分子都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俄国, 积极推动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鲁迅曾说, 从俄国文学里面, 看见了被压迫者的挣扎、善良灵魂的酸辛, 这些作品与四十年代的作品一起点燃希望, 又与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由此可见, 在这一时期俄国文学的广泛传播和接受, 并不是作为纯粹的审美作品, 更多的是作为思想资源存在。

因此, 尽管这一时期虽然翻译条件和手段十分落后, 但在短短十多年间, 中国还是翻译了大量一流俄国作家的作品。除了译介作品数量众多, 翻译质量也较高。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被翻译并印制成单行本, 各种综合性文集以及期刊上也都收录了许多的俄国文学作品。此外, 这一阶段中国作家的创作方式和风格也受到了影响, 中国文学中“为人生”的文学观就来源于此。其中, 鲁迅就是受影响颇深的作家之一, 他在读完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后, 大为震撼, 备受启发, 进而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俄国文学在这一

时期进入中国,其身份十分独特,是作为思想资源传播,这在世界的文学交往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3 20世纪50-70年代:从“导师和朋友”到“敌人”

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这一点从“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50年代,苏联作为“老大哥”,它的一切都是我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苏联文学也就自然而然的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据统计,这一时期译介的俄苏文学作品总量远超前半个世纪译介数量的总和,且在所有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俄苏文学占比高达三分之二。在这一浪潮下,除了大量一流作品被译入中国,还有许多二流三流的作品也被翻译为中文。正处于中苏蜜月期,许多中国青年学习俄语,能够阅读俄文原版书籍。也有许多国人赴苏联学习,经过正规院校的培养后加入了翻译俄苏文学作品的队伍,这也使得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译文品质更高,并且彻底改变了俄苏文学由其他文字转译而来局面。此外,这一时期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流行,再加之向苏联学习的影响,当时的文学组织形式和创作方法也效仿了苏联。当时的中苏作家来往频繁,使得他们的创作和阅读的作品几乎是同步的,因此,中国作家在创作的类型、题材上难免会受到苏联作家的影响。

茅盾曾说“这十年来我们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可谓“浩如烟海的书林”,“不知有多少青年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海鸥》《勇敢》等等作品中受到了教育”。这些作品与当时弘扬社会主义理想的时代氛围极度吻合,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甚至可以说这些书影响了一代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今来看,一些先辈们的“苏联情结”,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这些苏联文学作品。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作品当时在国内几乎是教科书般的存在,其中的主人公保尔一度在国内掀起了“保尔热”,他的名言“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要为人生的解放而斗争”也成了很多青年的人生信条。不过,尽管译介数量庞大,但还是有一部分优秀作家及其作品因政治原因未进入中国,因为这些作家受到苏联官方的抵制(如叶赛宁、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扎米亚京等),他们的作品几乎不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知。这种情况也造成了当时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出现了不全面、不平衡的现象,后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文学的基调和底色。

60-70年代中苏交恶,中苏政治关系全面冷却。与之对应的是,中苏两国的文学交流也进入了空白,甚至对立,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1962年后,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全部不在中国出版;1964年以后,中国所有公开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全部绝迹。原本俄苏文学作品中被人称颂的英雄人物,现在成了“反面教材”。国内翻译家们都开始绞尽脑汁的在已经译介的作品中寻找可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细枝末节进行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在1961-1966年期间,出版了一批包装简陋供批判专用的“黄皮书”,“黄皮书”的出现的初衷是要先了解“敌人”,再批判。这些黄皮书中就包含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如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焦尔金游地府》、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等。令人难以预料的是,这些黄皮书却收到了很大程度的欢迎,在那个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些作品悄悄在地下被传阅。俄苏文学在这一时期就是以这种“地下”方式延续着在中国的传播。许多中国作家在后来表示,如果没有这些作品,他们可能不会写诗,不会写小说。可见,当时俄国文学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巨大的文学和社会学的作用。

4 20世纪80年代:井喷时期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才有零星的俄苏作品译本出现,而这种情况一直到1980年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开放后,国内的文学氛围也开始活跃起来。俄国文学在这一时期作为推进思想解放的重要工具,又发挥了它的启蒙作用。在中苏友好时期培养出的翻译家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被迫休整,又重新投入到了翻译俄国文学的工作中。这一阶段,全国出版的俄国文学作品达上万种。并且专为译介俄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也相继问世,如《苏联文学》、《俄苏文学》、《当代苏联文学》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译介的俄国文学作品多为精华,还翻译了许多俄国大师的全集,如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且这一时期俄国文学译介的另一个特点是将重点放在了苏联文学,或许是因为之前已经译入了大量的俄国文学,而前十多年的封闭让人们们对苏联更好奇。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拉斯普京、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叶甫图申科等作家的重要的作品大都被介绍到了中国,这些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俄国文学的大量译介,促使许多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对俄国文学进行系统梳理和学术研究,召开各种

研讨会,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著作,并且成立了如今的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这些共同推动了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事业的空前繁荣。

5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译介量减少,影响力持续

90 年代的苏联解体对中俄两国的文学交往产生了巨大影响。最明显的就是苏联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量骤减。减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苏联便是苏联的解体,解体后的俄罗斯不管哪个方面都不能跟当时的苏联相比,国力和国际声望的下降伴随着文化和文学辐射的范围和影响缩小。第二,从当时的全球局势来看,英语和英美文化的话语权逐步上升,抢占了很大一部分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市场和读者。第三,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文学呈现了十分多元的局面,令人目不暇接,这使得国内的译者在选择和翻译文学作品时有了一定的难度。虽然苏联当代文学在国内的译介量大幅减少,但却出现了另一个情况,俄国文学中的经典在这一时期再度繁荣起来,被大量的重译。早在 80 年代国内就出版了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集,90 年代初期和中期又相继推出多位俄苏作家的全集,如《涅克拉索夫文集》《屠格涅夫全集》等。就单个作家而言,也出现了作品被重译的现象,如近些年来出版的有关普希金的作品集,除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 10 卷本外,还有《普希金文集》《普希金抒情诗全集》《普希金长诗全集》等。而且,从翻译的水准上看,这一阶段的不少重译本较以前的版本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由此可见,俄国文学经典名著在国人心中始终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进入新的世纪后,俄苏文学译介到中国的数量依然不多,但影响力却并未减弱。在这一时期更多的人关注俄罗斯文学不是因为政治或者社会需求,而是审美需求。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开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从这一点来看,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是得到了更严肃、更纯粹地接受。

6 结语

总体来看,初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是非常政治化的,并不是作为审美对象介绍而来的,而是作为思想武器和意识形态工具介绍而来的。俄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是非常社会化的,许多俄国文学作品几乎是全民作为教科书阅读的。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有关,但从某

种层面来说,这对俄国文学作品本身而言是稍显不公平的。文学的接受本身是非常个性化的,很少是铺天盖地接受的。阅读审美是私人的,阅读文学作品实际上就是发现个人内心最坚守的部分,时代和技术越发展,我们越要读诗,读小说,否则作为人、作为个体,个性就不存在了。因此,到 21 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不再担任意识形态这一使命,而是回归文学本体是一件好事。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价值伦理判断,从而推动中俄两国的文学文化交往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 [1]刘文飞.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N].中华读书报,20060517.
- [2]陈建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J].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4):41-46.
- [3]张建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
- [4]李雨桐,曹嘉琪,魏凤.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4(20):177-180.
- [5]李雪莹.俄苏文学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3):80-83.
- [6]郑晓婷,刘文飞.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声音——刘文飞教授访谈录.[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4(1):1-12.
- [7]饶翔.《“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形象、主体与时代》.[J].南方文坛,2017(2):31-40.
- [8]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国的传播.[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63-68.
- [9]冷文辉,许世欣.俄国文学的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纪念果戈理诞辰 200 周年、鲁迅《域外小说集》出版 1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J].国外文学,2010(1):155-157.

作者简介:高瑞(1994-),女,汉,陕西省榆林市,西安翻译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俄语笔译。

基金项目:西安翻译学院 2025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中俄文学交流中的俄罗斯文学译介研究”(项目编号:2025B56)。